

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

于吉楠

五、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

南下碰壁 被迫北上

毛主席说：“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就是历史的见证。

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国焘拉着红四方面军南下逃跑的时候，全军有六十五个团和一个骑兵师，共约十万人。十一月，到达天全、芦山、宝兴、名山地区后，因为路线错误，部队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处处碰壁，迅速减员，走上绝路。四川军阀刘湘集中八十个团的兵力，防守雅安、名山、邛崃一线，两军形成对峙，展开了激烈的消耗战，仅在雅安、成都间公路上的百丈关，红军同敌人十多个旅苦战七昼夜，就牺牲了数以万计的红色战士。一九三六年二月，蒋军六个师，配合四川军阀军队的主力，向天全、芦山疯狂进犯，突破了红军的防线。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越过党岭山，向西康东北部转移。三月间，先后占领了道孚、炉霍、甘孜、占化等地。张国焘南下建立根据地的吹嘘破产了，红四方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二十八个团四万多人。

在那极端艰苦的日子里，传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一九三六年二月，毛主席率领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山西，歼灭阎锡山匪军一万五千多人，扩大红军七千多人，广泛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红军、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形势越来越好。同时，党中央一直同红四方面军保持着电讯联系，一面转告敌情，指示活动方针，表示极大关怀；一面继续与张国焘路线进行斗争。尽管张国焘严密封锁，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还是逐渐了解一些真相，纷纷起来反对张国焘路线。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耐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积极促进广大指战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张国焘越来越孤立了。

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错误路线不肯悔改。三月十五日，他在道孚召开干部会议，在报告中继续坚持对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估计，胡说“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

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竭力否认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他继续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无耻地吹嘘南下逃跑“正确”，一再强调在康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对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反对，他使用法西斯手段进行镇压，疯狂叫嚣：“有了政权和红军的党”，批评要受“相当限制”，“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张国焘的错误领导，“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四月一日，张国焘又召开所谓“活动分子会议”，宣扬“南下的胜利和意义”，诬蔑党中央，借口“肃反”，打击陷害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革命干部。然而，张国焘的疯狂挣扎，终究改变不了红四方面军的困难处境，只能愈陷愈深。五月二十一日，他实在混不下去了，才被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粮食的缺乏”使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六月六日，在党中央的严肃斗争下，穷途末路的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偷偷换上西北局的牌子，但他的反党活动并没有停止。

这时，红二方面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艰苦长征，进入西康地区。张国焘利用二方面军远离党中央的机会，策划了新的阴谋诡计，妄图欺骗与吞并二方面军，共同反对党中央。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他一方面在红四方面军内开“锁口会议”，禁止广大指战员透露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又利用窃取的总政委职务，别有用心地电令二、六军团先后分成两路向甘孜前进，并派出先遣队远道去“欢迎”，以便进行离间和分化。

六月三日，红二方面军右路六军团在理化之甲洼寺与四方面军之三十二军首先会师。陈昌浩利令智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作“报告”，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是“退却逃跑”，进行反党反中央的煽动。王震同志当即给以严厉驳斥。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六军团干部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把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的陈昌浩，从讲台上轰下去。王震同志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打电报报告了红二方面军指挥部。

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很早就熟悉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他们向广大干部、战士，揭露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坚定地说：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只有北上抗日，才有出路。七月一日，红二方面军左路二军团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张国焘为了蒙蔽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编了个《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吹嘘南下逃跑“正确”，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错误”。贺龙同志看了后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并马上打电话通知各部队，把还没有打捆的反动小册子，统统收了起来。

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全部集结甘孜。他们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力量，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十分高兴。朱德同志对贺龙同志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在两军会师大会上，朱德同志向广大指战员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并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接着，他向大家宣布了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喜讯。广大指战员心情十分激动，全场一片欢腾，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张国焘黔驴技穷，又提出召开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妄图从组织上强迫二方面军

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还阴谋调换二方面军的干部，实行瓦解和吞并，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反对。任弼时同志当面斥责张国焘说：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我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再三来电督促；由于朱德、刘伯承同志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由于徐向前同志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张国焘的阴谋诡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经过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明确决定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甘孜会议后，红二、四方面军出发北上，向甘南前进。党中央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派聂荣臻等同志率领部队举行西征。七月二十二日，党中央致电二、四方面军，指出：我们正动员全体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之进攻，迎接你们北进；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敌人，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的伟大局面。

张国焘表面上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他被迫同意北上，只是想到甘南休整一下，以便寻找机会向青海西宁逃跑。因此，在八月底、九月初，红二、四方面军走过草地、北出甘南，占领洮州、通渭等地之后，他就悍然推翻了甘孜会议的决定，要部队停下来，建立“甘南根据地”，成立什么“甘南省委”和“甘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妄图继续搞独立王国。九月中旬，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张国焘更进一步提出西进青海的错误方针，坚持要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西进，到青海西宁，然后翻越祁连山去甘肃北部。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对张国焘再次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坚持北上同党中央会合。会议经过激烈斗争，重新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按照党中央九月十四日电令，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九月十九日，二、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张国焘不甘心失败，九月二十日，他跑到漳州四方面军营地后，立即写信给朱德、任弼时同志，推翻岷州会议决定，疯狂反对北上，并煽动广大指战员向西逃跑，污蔑“北上断送红军”。九月二十二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党中央，胡说“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叫嚷“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为了封锁中央、蒙蔽部队，他还卑鄙地下令部队各电台不得接收朱德同志的电令；凡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拍发。

九月二十二日，朱德同志冲破张国焘的封锁，向党中央发出电报，及时揭穿了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准备西逃青海的阴谋活动。接着，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赶到漳州再次召开西北局会议，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展开了坚决斗争。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命令张国焘停止西进，要二、四方面军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同时，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坚决抵制和反对西进青海的罪恶计划，张国焘的阴谋又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十月十日，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

西路军的失败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支柱，抗日民族革命

战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军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之后，集中一、二、四方面军的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安)兰(州)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军，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但是，张国焘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始终不肯放弃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他趁四方面军还没有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妄图再次拉走部队，脱离中央，逃向黄河以西，占块地盘，称王称霸。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用欺上瞒下的卑劣手段，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在靖远以西的虎豹口西渡黄河。党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制止。张国焘公然抗拒命令，让四方面军指挥部率九军和五军团继续渡过黄河。十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电令四方面军指挥部，带领红军返回黄河以东。陈昌浩不但抗拒命令，反而要求四军和三十一军继续渡过河西。十月二十九日，张国焘伪造党中央命令，将正在由郭城驿向打拉池转进，准备围歼敌人的四军、三十一军擅自拉走，前往三角城过河。后来，由于胡宗南匪军赶到，控制了渡口，四军、三十一军才没有过去。

西渡黄河的三个军组成西路军，开始了悲壮的西征。十月三十一日，西路军在一条山地区遇到马步芳部匪军的重兵堵截，曾经一度准备返回河东。十一月五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强令西路军继续西进，要他们占领甘肃北部的大靖、古浪、永登、凉州地区，“独立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又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反党分裂的狼子野心。

窃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陈昌浩，秉承张国焘的旨意，打着“建立甘北根据地”、“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的旗号，拉着部队，冒险西进。当时，马家匪军有十万人，西路军只有两万五千人，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形势十分不利。陈昌浩却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马家匪军不过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有绝大把握消灭”。毛主席、党中央曾经多次电令西路军东返，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返回静宁、会宁地区，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后来，为了接回西路军，毛主席派刘伯承同志率领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二十八军组成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向黄河靠近。但是，陈昌浩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向西越走越远。

十一月二十五日，西路军占领古浪。十二月三日，占领山丹、永昌。十二月二十九日，占领临泽、高台。这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无法建立根据地，红军饥寒交迫，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地势又不大好，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军事上也十分不利。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到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散防守各个支点，被动挨打，陷入马家匪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孤军血战，英勇顽强，杀伤了大量敌人，终因张国焘的路线错误，遭到了严重失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马家匪军攻陷古浪县城，红九军受重大损失。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马家匪军攻陷高台，红五军团全军复没，军团长董振堂同志壮烈牺牲。一月二十二日，马家匪军攻陷临泽，红九军余部突围。这时，红三十军、红九军余部和红五军团归来的少数同志，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还有八、九千人。马家匪军从四面包围上来，不断发动疯狂的进攻，红军

浴血奋战，歼敌万人，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处境日益不利。在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陈昌浩被迫决定回师东进，重返黄河以东，与中央红军会师。经过两天的急行军，西路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东进至西洞堡一带，全部歼灭了尾追的敌宪兵团八百多人。如果利用这一胜利造成的有利条件，继续东进，还有摆脱困境，实现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希望。但是，陈昌浩野心不死，顽固坚持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胡说歼灭马匪宪兵团的胜利，已经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红军已经转败为胜，错误地改变东进计划，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使西路军错过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陷入了不可挽救的绝境。

二月间，西路军回到倪家营子以后，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孤军血战，部队越打越小，许多领导干部和广大红军战士，为中国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三月初，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西路军余部从倪家营子突围，且战且走，先后转移到三道流沟和黎园口、康利寺一带。最后，红军经过英勇的拼杀，冲破马家匪军的重围，进入祁连山区，只剩下一千四百多人，西路军完全失败了。

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同西路军指战员心连心，积极设法取得联络。三月二十三日，西路军余部在青海巡堡以北之分水岭，接到了党中央的电报。电报指示：西路军现有部队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已经陷入绝境的西路军指战员，好象在茫茫夜海中，看见了灯塔，个个鼓掌欢呼，寂静的山谷里顿时沸腾起来。西路军立即复电党中央，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五月一日，西路军余部在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领下，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同党中央派来迎接的陈云、滕代远同志会合。这时，原来二万五千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八百多人了。西路军的惨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

延安会议前后

在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毛主席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始终把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及个别帮凶同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张国焘本人，在他自绝于党以前，一直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没有参加西路军的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从会宁地区继续北上，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回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身边。毛主席热烈欢迎、亲切关怀，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们团结一起，共同进步。

十二月二日，朱德同志率红军总部到达陕北保安，与党中央会合，张国焘也跟着到了保安。毛主席正在给红军大学上课，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在讲课中，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毛主席还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但是，那个时候，张国焘还在做着占领甘北、自立为王的反党迷梦，继续对抗中央，不肯承认错误。

张国焘的路线是极右的，但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他又以“左”的面目出现，向党进攻。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把瓦窑堡会议决议电告张国焘时，他就攻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什么“如韩文公之祭鳄鱼”。他到保安刚刚十天，发生了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规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张国焘一再跳出来反对，几次深夜扣门求见毛主席，要求杀掉蒋介石，扩大国内战争，同南京的亲日派遥相呼应。毛主席严肃批驳了张国焘的谬论，决定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叶剑英等同志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我们党和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完全失败，张国焘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后破产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错误。三月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张国焘的罪行，于三十一日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在川陕根据地已经形成“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根据地到成立伪中央，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决定》指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估计，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革命的力量，“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决定》在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时指出：“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指出：“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会上，张国焘装出一副可怜相，痛哭流涕地作了“检查”，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四月六日，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书，表示：“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入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延安会议决定，暂时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观后效。

延安会议以后，在党内和红军中深入而广泛地展开了揭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四月间，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都参

加了。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大量事实充分揭露了张国焘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张国焘的严重罪行，激起广大干部、特别是四方面军同志的无比愤怒，大家纷纷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开除出党并严厉惩办。毛主席在会上讲话，阐明了我们党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指出：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人，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四方面军的同志除在延安参加斗争外，四军和三十一军在援西军总部党委领导下参加运动，西路军余部也先后展开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冬，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从新疆归来的西路军余部负责人李先念等同志。毛主席亲切地说：你们回来就好，只要母鸡在，有鸡就有蛋。毛主席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惧怕国民党反动派，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毛主席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肉搏拚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不要丢掉。毛主席指出：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教育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严重斗争，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总结了经验教训，绝大多数坚定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他们同全党全军同志一起，团结战斗，以崭新的姿态，英勇地投入了抗日战争。

六、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逃离陕北 投降国民党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准备投降，掀起一股民族投降主义的逆流。在这种形势下，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撕下一切伪装，露出了投降主义者的本相。

延安会议后，毛主席、党中央给了张国焘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还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但是，张国焘的反动阶级本性和两面派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他痛哭流涕作“检讨”，都是为了骗人，实际上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准备最后叛党。经过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深入斗争，他在党内已经彻底孤立了，没有群众了，于是，他只有从党内跑出去，到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这样，就必然要走上公开投降国民党的反革命道路。

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有坐黄帝陵，位于国民党统治区。一九三八年清明节，国民党官员要去“祭祀”。张国焘抓住这个机会，同国民党特务勾勾搭搭，精心策划了一个叛逃阴谋。三月底，张国焘几次跑到毛主席那里，要求去中部祭黄帝陵，都被毛主席、党中央坚决拒绝了，并遭到严肃的批评。张国焘贼心不死，顽固对抗。四月一日，他在延

安城南的窑洞里同一个国民党“记者”密谋后，竟背着党中央于四月二日偷偷离开延安，逃到中部，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挂上钩，一同到了西安。

四月五日，张国焘到西安后，不住八路军办事处，而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住的西京招待所，同胡宗南密谈。张国焘的这些行为，引起他的警卫员的怀疑。当四月七日，张国焘登上胡宗南给他准备的专车，即将起程赴武汉时，他的警卫员打电话报告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林伯渠同志及时赶到车站，反复劝说张国焘不要走。张国焘不但不听，反而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林伯渠同志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为了挽救张国焘，便致电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寻找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当时的武汉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是蒋介石盘踞的地方。四月十一日，张国焘乘火车到了汉口大智门车站。周恩来同志派了几位同志到车站找张国焘，但是，等候了一段时间还不见张国焘下车，原来他躲在车厢里，东张西望地盼着国民党派人来接他。当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时，张国焘执意不肯，竟在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下，扬长而去，住进资本家开设的大华饭店。他不找党的组织，却电告党中央说：“不辞而别，欠甚”，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周恩来同志亲赴大华饭店，找到张国焘，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周恩来同志指出，张国焘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擅自离开延安是十分错误的。张国焘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公开表示，他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总路线与党的组织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绝望，不愿再干革命。他明明是来投靠蒋介石、进行反共活动的，却支支吾吾地说什么，要回江西老家去当老百姓，以后再不问政治了。他还恶毒污蔑党中央在延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错误的，进行反攻倒算。对此，周恩来同志一一进行了驳斥，指出：党中央对你的批评是对的，当时你已表示服从，怎么能出尔反尔！同时，责令他等待中央指示，不得擅自行动。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深夜。第二天，张国焘提出要看看市容，周恩来同志决定陪他去。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警卫员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张国焘回来，没了行李，只好到办事处去住。

住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期间，张国焘迫不及待地要求去见蒋介石。到了蒋介石那里，他开口就无耻地说：“兄弟在外胡涂多年”，向蒋介石摇尾乞怜，活现出一副叛徒的丑恶嘴脸。在回办事处途中，由武昌乘船渡江至江汉关码头上岸时，张国焘突然甩开同行人员，沿大街飞快逃走，又从汉口渡江逃回武昌，住进一家事先约定好的旅馆。经办事处同志四出寻找，直至深夜才把他找到。

张国焘还私自找托派头子陈独秀密谈。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国民党从监狱中放出来，妄图重新混进党内，从内部破坏革命。他的阴谋被党中央揭露，遭到失败后，便于三月十七日，在《血路周刊》上发表公开信，为托派辩护，对我们党恶毒攻击。他还写文章，要共产党“以在野党的资格”，“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国民党特务、反动文人纷纷出来帮腔。张国焘也向国民党记者发表谈话，叫嚷：“中国有没有托派？谁是托派？这都是谜”，“但有人硬派定陈独秀先生是托派，据我所知并没有那回事”，攻击我们党对“意见不同的，似乎没有比较适当的名称，往往以托派名之”。张国焘参加这场反共喧嚣是不奇怪的，因为他已经走上了陈独秀的道

路。张国焘还遍访当地要人，到处进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团结的各种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

四月十七日，为了最后挽救张国焘，周恩来等同志找张国焘谈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他提出三点办法：第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第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顽固拒绝。当天晚上，张国焘玩弄手腕，支开警卫员，偷偷跑到太平洋饭店，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接上头，乘武装特务保护的汽车，仓皇逃走，公开叛党当特务去了。

四月十八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四月十九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向全党详细说明了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揭露了张国焘叛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指出：“张国焘的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让张国焘等这类腐化的叛党分子滚出去吧。更加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加强党的团结与一致。吸收成千成万的优秀的革命分子到党内来，回答这些东西的叛党吧。”党中央对张国焘叛逃所采取的正确而果断的措施，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拥护。

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党小组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宣布了党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英明决定。他义愤填膺地说：张国焘是一个老野心家，老分裂主义者，老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反党分子张国焘，无损于我党一根毫毛，反而纯洁了我们的革命队伍。我们要坚决和张国焘划清界线，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后来，张国焘从国民党那边传信，要他的行李，还叫警卫员也跟他去。警卫员坚决不去，在周恩来同志的热情关怀下，返回延安了。张国焘叛逃，连一个警卫员也带不走，只剩下孤家寡人，这生动地说明：即使象张国焘这样窃据高位的人物，一旦叛党、叛变革命，就要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一致唾弃。

叛徒、特务的可耻下场

开除叛徒张国焘出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

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公布后，国民党反动派借此问题大作文章，一小撮特务、托派分子和反动文人，发出种种狂吠，上演了一出反共闹剧。张国焘粉墨登场，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表“声明”，五月六日又抛出所谓“敬告国人书”，象疯狗一样进行猖狂反扑。他一会儿在武昌的别墅里接见国民党记者，一会儿在汉口的小洋楼里发表反共谈

话，拚命为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效劳。张国焘竭力鼓吹国民党炮制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无耻宣称：“国家民族高于一切”，“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奴颜卑膝地表示愿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之下，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同时，他又极其恶毒地进行反共煽动，叫嚷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污蔑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攻击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策略路线错误”；污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什么“别立门户”、“貌合神离”、“效法军阀割据”。他按照蒋介石的调子，狂妄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自动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真诚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并“融化在国民党内”；交出人民的军队，“使八路军国军化”，取消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断绝同国际革命力量的联系，“实践”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共产党无条件地向国民党投降。尽管张国焘倒打一耙，污蔑党中央开除他的党籍是什么“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但丝毫也掩盖不了他的叛徒、特务的反革命面目。

我们党抓住张国焘这个反面教员，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揭露和批判，对张国焘叛党投敌的经过和他混入党内十七年的严重罪行，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揭穿了张国焘的谣言与诡辩，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立场和政策，在党内外掀起了声讨叛徒张国焘的怒潮。经过这场斗争，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教育了广大群众，张国焘被批得臭不可闻。

九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上，郑重宣布：“党巩固自身的队伍，驱逐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叛徒与逃兵”。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决定：“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他背叛了共产主义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将自己出卖给中华民族的敌人。主席团深信，张国焘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张国焘叛逃后，加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充当狗特务。他主办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从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他还为国民党训练特务，然后派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刺探情报，秘密策反。但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在全党坚如磐石的团结面前，张国焘牵不动我们党一根毫毛，拉不走一兵一卒，一切阴谋诡计都遭到可耻的失败。最后，当蒋家王朝彻底崩溃的时候，这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跟着他的主子，狼狈逃出中国大陆，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历史早已对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作出了最后判决。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我们党内出了张国焘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是一件大坏事。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也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

是好，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毛主席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强调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党有个教育作用、借鉴作用。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主席在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全面总结了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路线正确革命就胜利，路线错误革命就遭到失败或挫折。张国焘搞篡党夺权，有一条极右的路线，不克服这条错误路线，就不可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张国焘篡夺了一部分红军的领导权，搞军阀主义，妄图用枪指挥党，危害十分严重。毛主席总结这个教训，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教导我们要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防止张国焘这样的坏人，篡军反党。

张国焘搞分裂，拉拢私党，另立中央，推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是一个突出问题。毛主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党的纪律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保证，是统一全党行动的准则。张国焘搞机会主义，就必然要破坏党的纪律，从实行个人独裁，闹独立王国，一直到同党中央分庭抗礼。毛主席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共产党人出于公心，在政治上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张国焘野心勃勃，目的的卑鄙决定了手段的卑鄙，一惯玩弄阴谋诡计，耍两面派。他在公开的场合，用种种伪装来骗人，背地里则什么坏事都干，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政客的鬼蜮伎俩。张国焘事件尖锐地说明了反革命两面派的极端危险性。毛主席指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

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毛主席这些科学论断，不仅总结了反对张国焘路线的经验教训，而且深刻揭露了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共同的主要特征。后来，毛主席概括党内历次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明确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党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严重斗争，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止息。在“四人帮”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张国焘的幽灵，他那条篡党夺权的极右路线，那套反革命两面派的鬼蜮伎俩，那个分裂党的派别体系，都被“四人帮”继承下来，而且有了“发明创造”，更加阴险毒辣。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毛主席抓住要害，反复重申了三项基本原则，痛斥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凡是背叛三项基本原则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张国焘到林彪、“四人帮”，都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我们一定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全文完)



(上接 39 页)

但是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恐怕不是这样。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里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可见世界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光靠研究这样一个国，那样一个国，这样一个地区，那样一个地区，拼凑不起来一个全过程。不对若干重要课题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不在这种研究上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的局限，并且取得合乎科学的成果，要编成一部有特色的、好的世界史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下，社会科学界、历史学界的形势也在一天一天大好起来。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统一规划下，群策群力，为开展世界史学科独立的、有创见的研究，为提高这门学科的水平，编出有我们特色的世界历史而共同奋斗。